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
时论选集

第三卷

张枏 王忍之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三卷

张枬 王忍之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7.5印张 648,000字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2·486 定价 3.10元

河南

SHARH SHING

聲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第四卷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發行

目次	
● 詩歌	● 小說
● 散文	● 兒童
● 劇本	● 翻譯
● 時評	●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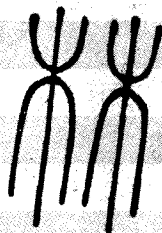
夏聲雜誌第一卷

越報

第壹期

本期刊送閱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第壹册



卷六月初二日再版發行

民

心

卷



第三卷序言

这一卷收的文章，是从1908年到1911年间出版的期刊中选取的。当时，全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包括英国、沙皇俄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都压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它们不但早就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而且把全中国划分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它们在中国倾销商品，开设工厂、银行，修建铁路，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贪婪地剥削广大中国人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清王朝，对外奴颜婢膝，大肆拍卖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政治支持和经济贷款；对内加捐加税，榨取民脂民膏，一部分用来维持镇压人民的军事官僚机构，一部分以偿付赔款和外债本息的方式奉献给帝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农民和手工业者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工人群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也受到了打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劳动人民为主体、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

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各地，次数愈来愈多，规模愈来愈大，形式愈来愈激烈。1910年爆发的湖南长沙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抗捐斗争，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这两次斗争，都有几万群众参加，并且都从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武装反抗。它们显示了城乡劳动群众的革命怒火已经不可遏制，必将烧毁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这几年中，资产阶级

革命派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8年有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和安庆之役，1910年有广州之役，1911年4月有著名的广州黄花岗之役。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真正发动和组织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总想只靠一次突然的袭击就取得全胜，他们所实行的这几次起义都具有单纯的军事冒险的性质，结果都失败了。可是革命党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的革命精神，对于要求革命的人民群众起了激励的作用。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的改良派和地方士绅，发起了争回路矿权利的运动，他们本来只想把他们领导的运动限制在请愿上书之类的“文明排外”的范围内，但是，日益倾向革命的广大群众逐渐冲破资产阶级上层的控制，使运动向前发展为罢市、罢工、罢课甚至武装暴动。各种形式的斗争汇集成为滚滚的革命洪流，一往直前地冲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清王朝。清朝统治陷入了土崩瓦解、四面楚歌的绝境。

反动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在咽气以前仍然要做最后的挣扎。在革命狂飚的威胁下，清王朝不得不变换统治策略，妄图在“立宪”这块招牌的掩护下，维护反动统治，扑灭民主革命。

清王朝在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在这之后，于1907年下令在中央筹设资政院，于1908年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和《宪法大纲》，规定在九年内完成“立宪”的准备工作。到了1909年，各省谘议局分别开会；1910年，资政院也粉墨登场了。“立宪”丑剧一幕接一幕演出，它的实质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原来清王朝所谓的“立宪”，根本不是什么对人民的让步，根本没有给予人民一丝一毫民主权利。恰巧相反，《宪法大纲》规定得很明白：“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君主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君主掌握军事、外交、黜陟百司等等大权，议院一概不得干预。号称“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完全是点缀门面的装饰品，不折不扣的清谈馆。为了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清王朝安排了一些大资本家充当资政

院的议员，但为数很少，议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宗室亲贵、大官僚、大地主。而且，资政院通过的决议是否可行，要“请旨裁夺”，也就是说，最后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清王朝手中。资政院尚且如此，谘议局就更是如此，它所议决的事项，对于各省督抚没有任何约束力。总之，立宪其名，专制其实。花样可以略事翻新，政权组织的形式不妨有所改变，“大权统于朝廷”却是无论如何不容更动的。这就无怪乎清王朝一方面接二连三发布谕旨、法令、章程，煞有介事地“筹备宪政”，一方面加紧训练新军，变本加厉地把权力，特别是军权集中在皇室亲贵手中。就在“筹备宪政”的名义下，清王朝排挤汉族军阀官僚，限制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宣布由摄政王载沣亲自统率禁卫军并任代理大元帅，载沣的弟弟载洵、载涛则分别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清王朝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筹备宪政”，一箭双雕，既用来欺骗麻痹人民、笼络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又用来集权皇室，强化暴力统治机器。所以，伪立宪不仅是政治欺骗政策的实施，也是暴力镇压政策的运用，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清王朝指望依靠这个反革命两手政策，来挽救自己免于灭亡。

劳动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统治阶级统治策略的改变，从不同的方面标志着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怎样对待清王朝的“立宪”？怎样对待群众的革命斗争？打算把革命纳入什么样的轨道、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收入这一卷的资料，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着与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一贯反对暴力革命，以为通过叩头请愿，就能促使清王朝实行立宪，就能取得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展的种种条件。如今清王朝果然宣布要“预备立宪”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还进入了谘议局和资政院，这就使得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兴头

十足，以为已证明了他们历来的主张是正确的、可行的，于是就更加起劲地推销他们那一套货色。他们原先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中失败了，但从来没有死心，这时又重整旗鼓，活跃了起来，或出版刊物，或组织团体，或运用谏议局、资政院这块地盘，全力鼓吹君主立宪。清王朝统治策略的改变，使改良主义思潮、君主立宪声浪，一时之间甚嚣尘上。

1908年到1911年间出版的主张君主立宪的刊物有《外交报》、《东方杂志》、《中国新报》、《国风报》、《蜀报》等等。在这些刊物中，由梁启超任主笔的《国风报》，是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即立宪派的主要的舆论阵地，它集中地表达了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观点。

《国风报》等刊物，一面歌颂清朝皇帝发布“预备立宪”的诏旨，是自古圣贤君王所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将以开百王未有之治，而履率土具瞻之望”（《国风报》：《叙例》），一面又批评清朝政府的立宪是“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国风报》：《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他们把事情说成是，在清朝皇帝和清朝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其实这种矛盾根本就是立宪派的虚构，清朝皇帝和清朝政府，不过是同台演出伪立宪丑剧的不同角色。可是，通过立宪派虚构出来的矛盾，却正好照出了立宪派自己的真实肖像：他们虽然对清王朝的“立宪”流于因循粉饰颇为不满，却还是不愿意也不敢和清朝决裂，而宁愿利用清王朝的“预备立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清朝皇帝的“立宪”上谕唱赞歌，不但可以给自己乞求立宪的运动涂上一道神圣不可侵犯的光圈，而且还可以借此欺骗人民，抵制革命。至于批评清朝政府缺乏立宪诚意，则是为了向清王朝索取权力，以便为资产阶级上层进入统治地位开辟道路。

《国风报》等刊物对清王朝伪立宪的批评，乍一看来，连篇累牍，有时仿佛很激烈。有的说：清王朝“筹备宪政”清单中规定要办

的几十个项目，“凶莽灭裂，不成片段”，绝大多数与召开国会并没有因果关系，而立宪政治的实质却是政府对国会负责任，“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不谓之筹办宪政”（《国风报》：《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有的说：“资政院之设，其制亦略似国会。然国会之为用，在于政府对之负责任。今资政院章程绝不见有责任之政府。政府无责任，则资政院何能为！”（《国风报》：《国会代表请愿书》）说来说去，归根到底，意思就是一个，要迅速召开具有实权的国会，建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政府，让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和地方绅士挤进政权里去。

在立宪派看来，只要能召开国会，而这个国会又具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的职权，那就能扭转乾坤，他们伤透脑筋的困难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些东西也能唾手而得。想要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收回一些权利吗？他们说，靠人民的反帝斗争只会坏事，那是万万行不通的，根本的办法是召开国会。（见《外交报》：《论粤民谋抵制日货事》、《论国会为治外交之本》、《论收回利权之宜有根本解决》；《中国新报》：《中国国会议》等篇。）想要防止人民起来造反吗？他们还是说：召开了国会就能“收拾已去之人心”，老百姓就“不至出位代谋”，“东奔西突，逸出范围，以倡横议”了（《国风报》：《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想要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吗？他们回答说，这就要“改良政治组织”，而所谓“改良政治组织”的意思也就是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此外，整理财政，振兴教育，扩张军备，澄清吏治等等，要做到这一切，在立宪派看来，也都非速开国会不可。国会成了医治百病的万应灵药。

召开国会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呢？这里的奥妙在什么地方呢？立宪派的想法不外是：一旦有了国会，他们依靠组织政党，大造舆论，就能取得国会的多数席位，从而操纵国会，控制政府，甚至由他们来组织政府，于是就会诸事顺利，天下也就太平了。把立

宪派的这个想法说得最清楚的是梁启超。他说：国会召开之后，“使于其时而国中有堂堂正正之政党出焉，揭健全之政纲以号召天下，而整齐步伐以从事运动，则国会势力必为所占。以之与无主义、无统一之官僚内阁相遇，其犹以千钧之弩溃痛也，进焉则取而代之，退焉则使官僚内阁唯唯服从也必矣。”（《国风报》：《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

由此可见，立宪派竭力鼓吹召开国会的实质，就在于企图用它来取消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抵制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就在于企图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权，至少是分享政权。

马克思曾经说过：“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87页）。恩格斯也说过：那些感染了议会迷这种不治之症的人，“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94页）。立宪派正是这种失去一切理智的议会迷。不同的是：欧洲大陆的议会迷，好歹总算是在已经有了议会的国家里活动的；而中国的立宪派，却在并不存在议会的时候，就被议会迷住了，就已经在那里幻想通过议会来支配和决定一切了。而且，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这样虚弱，依靠它自己那么一点点力量，根本就不可能争得西欧那种资产阶级议会。立宪派着迷地鼓吹“议会道路”，不过是盼望着能进入一个御赐的“议会”。

为了求得一个议会，立宪派在他们刊物上提出，要征集尽量多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名义，向清王朝请愿。他们写了许多文章和请愿书，反复向清王朝陈说利害，竭尽“向导”“忠告”之能事：

或者娓娓动听地诉说，召开了国会，就能保存君权、巩固皇祚，就能使人民踊跃输将、朝廷财政充裕；或者疾言厉色地告诫，不召开国会，就会酿成大乱，不出几年，民变、兵变就要遍于全国。他们说，“诚能动物”，只要“守公共之秩序，避过激之行动”，竭诚竭智竭力去请求，一次无效继之以再，再次无效继之以三以四，总会达到目的。总之，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乞求召开国会；然后，还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通过国会与清朝贵族、大地主阶级共同掌握政权，这就是立宪派为资产阶级挤进政权而设计的一条廉价的道路。

资产阶级立宪派把议会道路说得天花乱坠，但阶级斗争的现实却无情地宣告此路不通。立宪派的甜言密语，固然没有能打消人民的革命热情，没有能使人民放弃革命行动，就是清朝统治者也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1910年，立宪派搞了三次请愿上书的运动，要求迅速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清王朝想尽方法，一次又一次加以拒绝。第一次，清王朝说，召开国会的条件还不具备，因为“国民智识程度未划一”，教训立宪派“毋骛虚名而隳实效”。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立宪派一向诬蔑人民程度太低，以此作为反对革命的“理由”，清王朝如法炮制，也用同样的“理由”反对立即召开国会。第二次，清王朝说，“论议院之地位在宪法中只为参预立法之一机关耳，……而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这是对立宪派的当头棒喝，当然是从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但它确实道出了封建势力统治下的议会的实际价值。资产阶级要想取代封建统治势力的政权，仅仅靠议会是从从来不能达到目的的，主要的要靠议会之外的群众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第三次，清王朝虚与委蛇，答应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召开国会，并在这之前“组织内阁”。不过，这个“内阁”并不是立宪派所想望的、受国会约束监督的“责任内阁”，而是于1911年5月成立的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这又一次表明，清王朝出于进行行政

治欺骗的需要，即使可以召开国会，但要它自动交出政权，那是十足的痴心梦想。

资产阶级立宪派敌视群众，敌视革命，对群众暴力革命的恐惧远远超过对清朝政府的不满。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几次三番碰壁中吸取教训，他们还是不死心地讨价还价，继续请愿，要求取消“皇族内阁”。正当他们为此奔走呼号的时候，革命爆发了。“皇族内阁”连同清王朝整个反动统治一起，统统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不是由于立宪派的乞求，而是由于武昌兵营中的枪声！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立宪派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是革命道路对改良道路的胜利。辛亥革命前几年里，革命派出版的刊物，如《民报》、《河南》、《夏声》、《江西》、《越报》、《民心》等，在一片君主立宪的喧闹声中，逆流而进，坚持了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革命派出版的这些刊物，揭露了清王朝“假借立宪之空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民报》：《预备立宪之满洲》），“种种筹备之进行，并无以异平日之专制”（《民心》：《对于宪政之民心与立宪之不可得和平》）。它们指出了立宪派“请求”召开国会是替清王朝的立宪骗局推波助澜，为虎作伥，说“请求国会者，依赖政府也；依赖政府者，陷吾民也”（《江西》：《国会论》）。它们论证了唯有暴力革命才是出路的正确主张，说延续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决不是言论鼓吹、文章激励、结社标榜、扶策请求所能改变的，“宪法非费民血要求，专制之雄心不死”，“不能有革命之能力者，必不能成立宪之大观”（《民心》：《对于政府之民心》），“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河南》：《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

既然要用武器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也就会导致以批判的武器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孔学。在革命派的刊物上，提出并进行了一些批判儒家思想的斗争。《越报》上发表的题

为《名说》的文章说，儒家宣扬纲常名教，是适应统治者专制的需要，杀人于无形。这篇文章认为，要谋求中国的革新进步，就必须荡涤陈旧腐朽的思想，摆脱腐儒陋说的迷惑，象卢梭那样创造新的学说，改变社会的观念。《河南》杂志的文章，说孔“圣人”是被历代“君主”“利用之以箝制其下”的“怪物”（《无圣篇》）。又说，因为对孔学，“莫敢怀疑，故数千年来思想滞阂不进，学术陵迟，至不可救”（《无圣篇》的编者按语），主张不应“甘奴于千载上之陈死人”（《开通学术议》）。《新世纪》是一个主张不仅应当推翻清王朝而且应当打倒一切强权、一切政府的刊物。这个刊物，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抨击了儒家所维护的君权、父权、夫权，抨击了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提出要革孔丘的命，要把“国粹”和国家一起送到博物馆中去。（见《排孔征言》、《国粹之处分》、《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等篇。）革命派对孔学的批判，不论是以卢梭为榜样，还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归宿，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出发的。但是从这些刊物发表的反孔言论中看到的依然只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没有真正掌握启蒙思想的武器。而且革命派中的许多人还错误地把宣扬汉民族的封建主义文化，当做反对清朝统治的手段。因此，当时对孔学的批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很不够的，并没有能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堡垒。

这几年出版的革命刊物，虽然记录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为迎接革命所进行的一些政治鼓动和思想启蒙工作，但是也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远远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群众的革命运动年复一年地向前进，可是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反而减少了。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书刊的发行如雨后春笋，到了这个时候，就所剩无几了。正如有的文章所说的，革命报刊，“有支持数载终归丧灭者，有如昙花一现瞬息湮没者。……至今日而尚

留者，已如晨星寥落”（《越报》：《宣言书》）。清朝政府的封禁摧残，一些革命者从宣传革命思想转而投入革命的实践活动，固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些因素，而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是这种阶级本性，规定了他们没有能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来充实、提高他们贫乏的、不彻底的革命思想。于是，他们在上阵打了几个回合以后，就显出精疲力竭、难以为继了，就渐渐地露出衰败没落的景象来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向轻视群众，他们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群众反抗斗争，认识不够，不到群众中去做长期的、艰苦的组织工作，以为只要几个人进行暗杀活动，再加上掌握一点军队，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有的说：“往者，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祖宗玄灵于是焉依。毡裘之族，震慑而丧所持守，有甚于萍乡之举义”（《民报》：《崇侠篇》）。有的说：“革命积极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军人。用志专而行事简，流血五步之内，虽有万众无所施，夺元恶之魄，而作国民之气，惟刺客为能。然其组织不改，其团体固在，则去其一二分子，而代生者如故。必尽举而覆之，为拔本塞源计，莫如用军人。此不易之论也。军人之从事革命者，亦有二：其一，由革命党之自力所召集；其一，则本属于政府，入其室而操其戈。民贼独夫恃军队为保障，而军队亦与民党合，则彼失其所恃。抑使为革命者无筹饷备械之多费，事半功十，计莫便于是”（《民报》：《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虽然《河南》杂志有的文章对暗杀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之君主、官吏，杀之不胜杀”，“杀一恶劣官吏”，“其影响未能见于实际之改革”（《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但是，不论哪一种说法，他们共同的思想是，要赢得革命胜利，并不需要做发动群众的艰苦工作，并不需要依靠群众的革命斗争。革命派幻想“事半功十”的革命，而没有把自己的斗争和群众的斗争

相结合，更谈不上去领导群众的斗争。他们甚至担心下层群众将来会“奋臂以夺政权”，打算用“约法”来约束人民群众，使群众顺从他们所要求的“秩序”。结果就使他们处于十分虚弱的地位，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贯认定清王朝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们认识不到，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严重障碍；更认识不到，帝国主义是民主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就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并没有为所有的革命者真正接受。当着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因为脱离群众而失败、同盟会陷于困难境地的时候，它内部在纲领方面的分歧就进一步表面化了。1908年初，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特地发表声明说：“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谈”。本来还有一点反对封建制度色彩的“平均地权”，在这以后的《民报》里再也看不到了，甚至还发表文章反对“惑于均产之说，专为平民生计，不求光复良谟”（《崇侠篇》）。而所谓“光复”，所谓“发挥民族主义”，又不是指反对帝国主义，而仅仅是要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临近的时候，革命派的喉舌所宣告的革命目标竟是这样的狭浅。

革命派坚持认为，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是他们比立宪派高明的地方。但是，革命派中的大部分人和立宪派一样，当时也已经害着“议会迷”的病症。他们反对君主立宪，而主张民主立宪，以为只要把满族皇帝打倒，只要有一个所谓民主的议会，就万事大吉了。这种“议会迷”，不过在形式上和立宪派略有不同罢了。因此，等到皇帝一倒，革命派中的许多人和立宪派之间的差别就微乎其微了。他们不再继续革命了。他们那一点点革命精神，很快也就丧失殆尽了。